

· 性别文化视野下的路遥创作专题研究 ·

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

——以《人生》为例

马春花, 史秀东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路遥的《人生》以主人公高加林的个人主义奋斗为中心, 揭示了1980年代初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系列新的变化。以高加林返、离、再返乡村的人生道路及其在巧珍与亚萍间进退失据的爱情选择为线索进行探讨发现, “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男性身上隐喻了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欲望与挫折, 以及“乡土中国何去何从”这一历史症结, 对解读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路遥; 转折时代; 乡土中国; 城市现代性; 乡土现代性; 性别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6)03-0063-06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 脱胎于其1970年代末处于构思中的短篇小说《刷牙》, 小说由“刷牙”这一日常卫生习惯在农村的出现, 来隐喻改革时代农村对现代文明的想象和实践。之后, 由于受其胞弟王天乐进城经历的影响, 路遥将短篇小说《刷牙》扩展成了中篇小说《沉浮》, 《沉浮》后来经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建议改成《人生》, 在《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1]。而对《人生》的关注, 也从文坛、知识界扩大到众多普通的读者, 一时间, 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高加林选择是非的判定等等, 众说纷纭。很多读者甚至将作者路遥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 向其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2]的问题。

《人生》中高加林离返乡村的人生出路的困境是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特有的现实问题, 其之所

以引起国人如此大的共鸣, 很大程度上源于在这个乡村知识男青年身上凝聚了太多时代的焦虑与困惑, 其留在乡村还是奔赴城市的个人主义奋斗, 与其爱情抉择——背弃农村/刘巧珍还是接受城市/黄亚萍——所带来的道德审判紧密相连, 同时也与转折时代中国乡村向何处去的现代想象极为相关, 在此, 现代想象通过性别关系的构建而得以体现。而在高加林这个“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男性身上, 承载的正是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现代/性的焦虑与希冀。

—

1980年代初, 从乡村进入城市的路遥, 面对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 震撼之余, 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生事物“几乎象征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面貌”^[3]。《人生》中的高加林身处的正是这样

收稿日期: 2016-02-10

作者简介: 马春花(1973—), 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女性主义研究; 史秀东(1991—), 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研究。

一个“立体交叉桥”：从空间来说，他出生于一个“城乡交叉地带”（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在此地“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4]；从时间来说，高加林“人生”起点的19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即将展开，而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试点，“城乡交叉地带”正“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5]（P404）}，虽然高加林所在的农村因书记高明楼的抵制还未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即使他也知道人民公社与生产队大势已去，包产到户势在必行。《人生》以现实主义笔触展现了一个正在变动中的孕育着生机与希望的农村。这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复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出现了多种可能。经济因素逐渐在乡土空间内活跃起来，农村各路“能人”崛起，分解着曾经的政治权威对乡村的支配。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高加林因其民办教师职位被大队书记的儿子顶替而不得不重返农村，其人生命运似乎不得不与其出生的农村连在一起，但此时的农村似乎已经为高加林的人生发展提供了几种可能：第一，他可以成为村里的政治权威，像大队书记高明楼一样，在“公社、县上都踩得地皮响”。尽管他爹在村里窝窝囊囊，他也是一无所所有，但他凭借知识、见识以及男人的狠劲子和雄心，使这条路看起来并不遥远。高明楼虽然把他的民办教师拿下了，但心里很怵他，怕他复仇。第二，成为经济能人，像巧珍的父亲刘立本那样，凭借“走州过县做买卖”的本事发家致富，成为村里仅次于高明楼的“二能人”。虽然高加林挎篮卖馒头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或不愿做生意，而是因为到县城集市上卖馒头的行为，与乡村/女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而这威胁并羞辱了高加林的男性气质。其实从其回乡不久就“养了许多兔子，想搞点副业”来看，他不会成为商品经济大潮的落伍者。第三，可以像“做庄家和搞买卖都是一把好手”的青年马栓一样，成为技术能人。可以想象，高加林即使留在

农村，也有实现自我的多种可能。他也会像高明楼和刘立本那样，建起一线五孔的大石窑、圈围墙、盖门楼、虎踞龙盘，成为大马河川里的一道风景，然后娶一个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刘巧珍，领着她一起刷牙，给水井撒漂白粉，改变乡村落后的卫生习惯，实践一种虽不同于城市但依然现代的生活，我们暂且称之为“乡土现代性”吧。

可是为什么路遥偏偏不给高加林成为农村“能人”的机会而一定要千方百计让他的人生重新从城市开始呢？一个农村知识青年一定要进入城市的人生道路可能联结着怎样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呢？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加林也许会成为一个梁生宝式带领农民走集体富裕道路的英雄人物，其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必须以集体主义的形式才能落实。但1980年代是一个个人主义浮现的时代，个人不必再依附于集体，潘晓的“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6]之所以引起广泛讨论，也如高加林的个人主义奋斗引起共鸣一样，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反映。

受过现代教育的高加林对县城、省城、大都市甚至国外现代都市空间都怀着热切的向往，毫无疑问正是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对高加林来说，实际上不管政治能人、经济能人还是技术能人，都还是农村人，而他对未来现代生活的设想，却无法在农村自动生成，他渴望的是一种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或者说城市现代性，在城市、文字中，而非在农村和土地上，他更能感觉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那种干预社会与生活、兼济全球的个人主义式的雄心和抱负。而相比于城市，农村还是太落后太贫困了，即使是在被称为农村“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初期。实际上，青年一代农民对农村的逃离自民国以来就相当普遍，像胡适就曾感叹，民国时期，连小学毕业生也不愿再回乡耕种，出身乡里的孩子一旦受过教育，就变成一种“特殊阶级”，不屑于“种田学手艺”，“宁做都市的失业者而不肯做农村的导师了”^[7]。看来现代化的过程一直是一个城市现代化的议题，现代知识和乡村共同体之间矛盾的日益加深，新中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让知识青年下乡，都

无法完成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的差距与隔绝,以至于哪怕有一线机会,没有哪一个农民会甘心被束缚于乡土社会。

因此路遥让高加林进入城市而非留在乡土,是有深层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因素的,即使经济改革使1980年代的乡土中国有了实现现代化的可能,但依然难以阻挡乡土知识青年走向城市的步伐,像高加林这样雄心勃勃的乡村男性知识分子,离开乡村流动到城市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高加林奔赴城市的勇气和热情,在1980年代初期还只存在于个别知识精英身上,而1990年代后,农村经济改革停滞,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现代性项目全面展开,奔赴城市几乎就是全体青壮年农民的集体行动了,高加林式的个人主义“人生”发展故事,也就变成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工无可选择的生存故事了。

二

《人生》中高加林的身上有路遥胞弟王天乐的影子,路遥自己曾说过,对于高加林这个人物,他是怀着“兄长般的感情”^{[5] (P407)}来书写的。其实,像高加林这样雄心勃勃离开农村在城市寻找发展机遇的“于连”式的个人主义者,在1980年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高加林的原型如此,新时期许多农民出身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包括路遥自己,他们以写作、当兵、高考等方式,一个个离开农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哪个不是高加林呢?但当他们一旦获得进入城市的机会,便投奔而去,不再回头。莫言自己也曾直言,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时,对故乡实际是充满了仇恨的。但与现实境况相对,路遥对乡土却有别样的写法。

进入城市后,高加林春风得意,“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而且事业爱情双丰收,与黄亚萍志同道合、罗曼蒂克的爱情显然只能在城市里展开。但正当高加林的城市现代生活如火如荼地展开时,路遥却当头一棒,阻断了高加林的人生。克南(高加林的情敌)妈妈解开高加林进入城市的秘密,高加林不得不被组织退回农村。而与此同时,乡土空间里挚爱着高加林却被他无情抛弃的巧珍突然赌气般地匆匆嫁人,这无疑切断了高加林在乡土生活的最后一丝温

存与希望。被迫再次返乡的高加林既失去了城市个人主义发展的依托,也失去了心爱的农村姑娘,最终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路遥为何一定要将高加林打回农村,高加林身上负载了转折时代何种现代(个人)发展的伦理道德困境?

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新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秩序无疑为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可能,但与此同时,滋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公领域的溃败、腐败、赢者通吃、道德沦落等也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之恶。像高加林,其民办教师一职被高明楼动用私权拿掉后,他虽然决心要凭自己的实力跟高明楼拼个高低,但事实上他争取个人发展的方式却又宿命般地步了高明楼的后尘,“走后门”的行为使他同样成为某种不义行为的践行者,他无力甚至也从未想过如何去改变这恶的链条,而是不折不扣地延续了普遍存在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继续在相同的权力运作机制和生存逻辑中践行自己的人生道路。

当然,要求高加林以微弱的一己之力去改变整个权力的运作机制,既不现实,又太过苛刻。而路遥对高加林的批评或者说惩罚,主要在于其个人主义奋斗历程中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背弃,具体而言是他对农村姑娘巧珍以及她所象征的故土的抛弃。在通往城市空间的过程中,高加林实际上扮演了“陈世美式”的负心汉角色。进入城市以后,面对与乡村截然不同的生活与交往空间,加上现代女性黄亚萍主动炽热的精神示爱与利益诱惑,高加林毅然与农村恋人巧珍分手。大马河桥头一别,不仅是其与巧珍的诀别,更是与生养他的黄土地的诀别。作为转折时代的前奏,高加林的个人主义奋斗无疑与时代要求相合,但伴随其中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则无疑又是路遥这样身处时代转折关口的知识分子的焦虑之源。高加林身上反映着时代和其自身的双重局限,“如果说他觉醒了的追求意识闪烁着时代光芒,那么,他的追求方式则映现了时代的阴影部分。时代画面的明暗调子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8]。高加林在被塑造为新时期个人奋斗先驱的同时,承载于这一人物之上的转折时代的历史之“恶”和伦理道德困境,却是作者所面临的巨大书写难题。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将高加林再次打回

农村,经受道德和心灵的谴责,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除了个人主义奋斗伴生的历史之恶与道德困境外,实际上还有一个背弃乡土的知识分子对故乡的复杂情感的问题。乡土社会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中,实际上正遭受着日渐猛烈的冲击。“当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的衰败,因为许多问题恰恰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9]农民世代依附的土地和农业资源开始卷入商品化过程,几千年农业文明中的那些永恒的因素在商品市场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路遥,这个生长于陕北黄土地的农民作家,其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深深的“恋土情结”。在《人生》中,作者通过巧珍和德顺爷爷这两个近乎完美的农民形象,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充满爱与温情的道德化的乡土“乌托邦”。巧珍美丽善良、多情温柔,即便被抛弃仍不计前嫌,到处为高加林说好话。而德顺爷爷在路遥笔下也不仅只是一个“满身补丁的老光棍农民”,他宛如一位“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像一个哲学家”,每每用自己黄土地上打磨出的人生经验为对生活感到失望的高加林讲述深奥的人生道理。在这两个人物身上,路遥表现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5](P409)}。

路遥笔下的巧珍和德顺爷爷俨然成为传统美德的化身,他们热爱并驻守着这片路遥已然无法回归的西北黄土地,与高加林这个背弃乡土的负心汉形成鲜明对比。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路遥也是高加林,而乡土正成为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巨大的道德焦虑之源,正是通过营造道德化的乡土“乌托邦”,路遥们缓解了充斥于文本内外的那种“精神上升与道德下滑构成的历史转折期的尖锐矛盾”^[10],从而转移知识分子离弃乡土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其实这种焦虑不仅是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的焦虑,同时也是1980年代潘晓式的那些“自我奋斗、个人追求同生活发展不协调的冲撞”^[11]的体现。高加林扑跪在陕北高原,“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的场景类

似一种“仪式”,此时的高加林已然成为转折时期现代中国焦虑的载体,而那个原乡的乌托邦,不过是注定要背离它的知识者甚至现代中国的慰藉和想象而已。

三

转折时代“人生”的个人主义式的发展焦虑,黄土地上“子一代”的农村知识分子对城市文明与现代化的追求,是通过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萍的爱情纠葛得以展现的。高加林徘徊于乡土/巧珍与城市/亚萍之间的“人生”情爱故事,实际上转喻了转折时代乡村中国向何处去的可能与困惑:是选择巧珍/乡土,践行一种乡土现代/性,还是跟亚萍远走高飞来落实一种城市现代/性的发展方案。在此,转折时代乡土中国的现代化想象与实践以一种性别政治的面貌得以表征。

乡土空间中高加林与巧珍的恋爱,颇有些“才子落难、佳人搭救”式的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色彩。乡村佳人刘巧珍是“川道里的头梢子”,有着不似普通农村姑娘的精致面孔与白杨树般挺拔的窈窕身段,她虽没有上过学,但“天生的多情”,天然向往知识与文化,“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她嫌马栓“没文化、脸黑”,爱“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的高加林,爱他“飘洒的风度,漂亮的体型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高加林第一次被迫返乡为两人的爱情创造了机缘,在与巧珍的交往中,高加林一直扮演着对乡村/女性进行现代/男性的启蒙者的角色,引导巧珍如何过文明现代的生活。正是这种引导和启蒙的过程,使高加林即使重返乡村,也并未因人生的挫败而丧失其男性/现代气质,农村姑娘巧珍全身心的爱情(驯顺)反而凸显了他的男性/现代气质。

而对巧珍来说,高加林的出现,补偿了她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一直呆在农村的缺憾,与加林哥在一起,巧珍既尝到了一种现代恋爱的滋味,又体验了何谓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子佳人”这种中国传统、上流阶层的爱情方式,正是1980年代乡村姑娘巧珍想象与渴望的现代/性生活。尽管最后高加林

弃她而去,再次上演了一场“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剧目,但切不可因此而把巧珍看作是这一爱情空间中的被动者与牺牲者。其实,在与高加林的爱情互动过程中,巧珍表达了一个农村女子所能表现出的所有勇敢、力量和智慧,从这点来说,看起来温柔善良的传统乡村女子其实很有现代爱情所强调的自由精神。她对父亲的反叛、对乡村传统伦理的反叛,让人想起五四那个“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干涉我自由”的子君。

在没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村姑娘巧珍那里,对高加林的爱情与其对现代知识、文明的渴望是一致的。但是对受过较高教育的高加林来说,与农村/巧珍的爱情,显然与他想象和渴望的现代/性生活并非一致,乡土爱情需要经过转化或幻化方能达成。高加林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巧珍,当巧珍帮他卖了馒头俩人一道从县城回家时,他注意到了巧珍的美,他“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和巧珍一样的姑娘。他仔细回忆一下,才想起他是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鲜红的头巾”在加林与巧珍的爱情中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细节,恋爱伊始,巧珍缺少这样的头巾,后来高加林进城后给她的礼物就是一条“鲜艳的红头巾”。通过把巧珍想象和改造造成戴“鲜红的头巾”的俄罗斯农庄姑娘(对像路遥那样在1950~1970年间成长起来的作家来说,苏联无疑是现代的象征,就如之后的美国),高加林在乡土空间里的爱情才能与其对现代/性的想象一致起来。但是这种转化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一旦进入城市空间,狗毛褥子、十二个猪娃之类与乡土相关的亲切话题就马上变成了“乏味”,让人“烦躁”,即使让巧珍真的戴上了俄罗斯姑娘标志的红头巾,也无济于事了。大热的夏天,巧珍戴着加林哥亲手围上的红头巾,不仅不让人感到爱的愉悦,反而有无尽的哀伤。董丽敏认为,巧珍与加林爱情的失败“其根源正在于双方因知识所形成的心理、身份乃至职业的分歧已经超出了双方情感可以调适的范围”^[12],这种分歧是知识形成的,其实更是双方对未来的现代/性的想象的差距所造成的,巧珍对爱情和现代生活的想象

终点,只是高加林的起点而已。

高加林对现代/性的想象,只能与黄亚萍这样的城市/现代的女性在一起才能落实。在广播站工作、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黄亚萍,父亲是县委常委,她见过世面,聪敏、大方又不俗气。在黄亚萍的眼中,与原先恋人克南的庸常、无趣不同,“加林的性格、眼界、聪敏和精神追求都是她最喜欢的”,他“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连高加林发火都具有一种独特的男性魅力:“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男子汉,大丈夫,血气方刚”,“张克南你就是把刀放在他脖颈上都发不起来火!”与巧珍不爱老实能干的马栓类似,城市姑娘亚萍在城市青年克南身上,也无法找到自己渴望的现代/性生活,尽管他们门当户对,身份相当。农村姑娘巧珍和城市姑娘亚萍,在高加林身上都能寻找到自己渴望的未来现代/性生活,这当然与作者路遥将“知识”与“性”这两个现代性因子在高加林身上得到完美展现有关,同时也进一步影射出中国未来的现代/性道路,它似乎注定与城市相关,与一种强力、独断的男性气质相关。

基于县城里高中时代建立起的笃深情谊,以及志同道合的精神追求,高加林和亚萍之间更多的是因共同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追求所形成的现代/苏俄式的两性关系。在乡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志同道合的爱情模式象征了一种向上发展的时代可能。与乡村姑娘巧珍相比,亚萍因其城市出身、父亲地位等背景,无疑掌握着更多的现代性资源,既能为高加林提供丰厚的物质支持,从生活方式上使其更具现代性,更重要的是,她还能帮助高加林去南京,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现代都市空间。因此,在乡村与城市间,在县城与帝都间,孰高孰低,立下分明,乡村能人的漂亮女儿终究不敌县委常委的千金。因此,与其说传统温柔善良美丽的巧珍终究不敌现代霸道的亚萍,是知识战胜了传统,不如说是城市、现代甚至是特权阶层(假设亚萍只是个底层的城市女性呢,也许结局不会这么立见分晓)在性选择上的

胜利。高加林、马栓与巧珍,高加林、张克南与亚萍,这两对“三角恋”的分分合合,正暗示了转折时代乡村与城市未来的现代性道路。而高加林,这个“城乡交叉地带”的知识青年,其悲剧就在于一直徘徊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既无法实现城市现代/性的“人生”追求,也无法退回乡土,与心爱的姑娘一起开拓乡土现代/性的可能,他的“人生”正是转折时代乡土中国欲望与挫折的隐喻。

在被称为《人生》续篇的《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乡村的高加林们不再徘徊于乡土与城市之间而进退失据,而是设置了更多的出口:既可以像孙少平那样最终通过揽工而获得城市工人身份;可以像孙少安那样驻守乡土,乘改革之风办起乡镇企业,实践一种不同于城市现代性的乡土现代性项目;也可以像孙兰香那样所谓“知识改变命运”,考上大学而进入城市。于是,城市现代性和乡村现代性不再那么不可调和,乡土乡民的“平凡的世界”中,竟然有如此多的可能与希望,经过了转折时期的“阵痛”和迷茫之后,路遥/高加林们信心十足地走在了“希望的田野”上。

不过路遥早逝,没有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新一轮市场经济改革后,那处于社会改革边缘和弱势的吾土吾民们少小离家、老弱回乡,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劳力献给城市,却无法真正在城市落户栖身,农村、土地成为无法“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的最后出路。

参考文献:

- [1] 王天乐. 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A]. 李建军. 路遥十五年祭[C].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192.
- [2] 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A]. 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
- [3] 路遥. 致中篇小说选刊[A]. 路遥. 早晨从中午开始[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117.
- [4] 路遥. 关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通信[A]. 路遥. 路遥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64.
- [5] 王愚. 路遥. 关于《人生》的对话[A]. 路遥. 路遥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 李春玲. “潘晓讨论”是非功过评说——访关志豪、谢昌远、魏群[J]. 青年研究,1993,(9):12.
- [7] 胡适.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A]. 胡适.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25-226.
- [8] 李劫. 高加林论[J]. 当代作家评论,1985,(1):71-72.
- [9]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A]. 汪晖. 死火重温[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6.
- [10] 程光炜. 关于劳动的寓言——读人生[J]. 现代中文学刊,2012,(3):59.
- [11] 王愚. 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J]. 当代作家评论,1984,(2):41.
- [12] 董丽敏. 知识/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重读人生[J]. 南开学报,2014,(6):35.

The Modernity/Sex of Rural China in Transition: On the Novel *Life*

MA Chun-hua, SHI Xiu-do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Lu Yao's novel *Life* focuses on the individualistic struggle of the protagonist Gao Jialin, revealing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in rural China during early 1980'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Gao Jialin's experience of leaving and returning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as well as his choice between Qiaozhen and Yaping as a clue, to discuss the hope and dilemma of rural China in turning stage, which is reflected by the male intellectuals leaving in the dual area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This study is significant for exploring the direction of rural China's development and its modernity in turning stage.

Key words: Lu Yao; turning stage; rural China; urban modernity; rural modernity; gender